

文化經濟學與情緒政治 -
否想香港的新自由資本主義¹
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前言

在尋找資本主義的另類實踐計劃時，直面文化與情感的政治至關重要。借助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與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以香港的經驗為例，本文嘗試指出，資本主義並非是由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系統，也非建基於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而是一個由各種特定的意義和情緒構成的情感-象徵秩序(affective-symbolic order)，支撐着社會政治領域中的各類壟斷踐行。而在當代香港的情感-象徵秩序中，不斷(再)生產和(再)傳播的意義和情緒，主要是由新自由主義的空洞能指和犬儒感覺所構成的恐懼和苦悶。

在一些批判學者和社會行動者眼中自相矛盾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循文化經濟學與情感理論的角度看，並非是主流經濟論述的弱點，而是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核心文化--當中被資本主義辯士採用的空洞能指，不包含任何清晰的正面內容，而是嘗試命名「一種不可能存在的整體」(Laclau 2005)。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並不在於其邏輯及概念上的連貫性，而是依靠在語言和心理層面的根本性投資(radical investment)，當中情感扮演着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想尋找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類文化與社會關係，我們或許需要更認真地投入處理文化與情感的領域。

重溫資本主義不是甚麼

借用世界體系的歷史社會學視野，筆者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指出，資本主義並非是由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支撐的經濟系統，也非建基於理性計算的運作，而主要是一個依靠壟斷特權逐利的社會制度和過程，當中語言和意識形態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和之後的政府大規模救市，再加上近十年世界各地的貧富兩極分化持續惡化，侵佔民眾土地個案不斷發生，資本主義並非等同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模型，而是有利於少數壟斷特權謀利的看法，變得相對容易理解。這裏只想簡要補充一點，在香港這類高度城市化的現代(或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隨著通訊科技的發展、經濟運作的金融化和工作安排的彈性零散化，傳統意義下的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也愈來愈不穩定。

當Joseph E. Stiglitz(2006)² 與克魯曼(Paul Krugman)³ 等為經濟學界認可的學者，有理有據地指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妄，以至美國前聯邦儲備局主席Alan Greenspan也得承認新自由主義意識

¹ 本文部分章節引用及改寫了作者近年在香港《明報》發表的幾篇文章(部分收於許寶強 2009 和 2012 內)，為方便閱讀，不在內文中一一註明出處。

² Joseph E. Stiglitz 在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6 年 3 月)指出，大部分宣稱貿易自由化會帶動經濟增長的研究，除了存在大量統計問題以外，其實只是在說明貿易量愈多的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愈快，這可經由各種貿易補貼或其他政府推動貿易的政策所導致，因此並不是證明瞭貿易自由化能帶動經濟增長。那些真正嘗試找出貿易自由化(如降低關稅)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少數研究，得出的結果則並不令人信服。

形態的錯誤時，左翼學者如大衛·哈維(Harvey 2005)等觀點--指出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本質是一系列由全球資本精英打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嘗試把財富從佔人口大多數的民眾轉移往一小撮的富裕階層手裏一便顯得不再那麼不合時宜⁴；而被佛利民及傳統基本會等美國新自由主義辯士稱為全球最自由的香港經濟，實質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反市場競爭的安排：例如十九世紀中後期到二十世紀初的鴉片專賣、戰後至2003年才廢除的白米進口配額制度、政府建造了曾安頓約一半人口的公共房屋、專利壟斷的公共交通、電力、燃油、煤氣等市場，以及金融領域的聯繫匯率和長期容許銀行公會決定利率上限等政策，地產市場的高度集中和操控，甚至不斷立法驅趕小販保護超市壟斷的食品市場、限制人口自由進出的優才移民法，均呈現出各式各樣反市場的壟斷或寡頭壟斷，這種在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當道時難以言說的觀點，今天也不再不可思議。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僅與事實不符，它的辯士自己也不太願意信守新自由主義教條。例如，當放任主義教條可能有損英美政府或大企業利益時，列根或是戴卓爾夫人等新自由主義推手，也往往支持政府干預⁵；而儘管把海耶克和阿當史密斯奉為祖師，但新自由主義辯士卻很少會認真閱讀他們的著作⁶。

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Hayek 1994a)的第三章清楚指出，他並非反對一切的政府干預，因為有時政府的計畫也能夠用來促進競爭，也就是「為了競爭而做的計畫」(planning for competition)。因此他提醒我們：「絕不要把反對這種計畫等同於放任自流的教條」(It is important not to confuse opposition against this kind of planning with a dogmatic laissez faire attitude, p.

³克魯曼以美國為例，指出在1947至1976年認可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佔主導的期間，美國家庭的實質收入中位數增加了一倍；但1976至2005年放任主義流行的時段，美國家庭的實質收入中位數只增加了23%，遠低於之前的增長。克魯曼認為，76年以後美國家庭收入相對前一階段低的原因，除了是經濟增長率較低以外(不錯，在這個放任主義佔主導的時段，經濟增長確實不及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時段！)，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不平等的明顯上升：戰後二三十年美國增長了的經濟財富，較平均地分配給整體人口，但70年代末以後，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長隻及平均收入增長的三分之一，而極少數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則驚人地上升。...克魯曼總括，儘管那種認為放任自流的政策對美國的經濟和普通市民生活水平都帶來好處的說法十分流行，但能夠支持這種看法的實證數據卻少得可憐。(Krugman 2007)

⁴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70年代中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70年代的70%劇降至80、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Harvey 2005)

⁵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Harvey 2005)

⁶已故的法蘭克(G. Frank)曾指出，他的老師佛利民的經濟課並不要求學生閱讀阿當史密斯，只讓他們讀十分簡要的二手資料。

41)，而要保衛市場的自由競爭，政府必須做一些事情，「如果政府什麼事也不做，將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被合理地維護」(In no system that could be rationally defended would the state just do nothing, p. 45)⁷。

無獨有偶，被新自由主義辯士尊為祖師的阿當·史密斯，本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關注低收入工人的福祉，但死後卻漸漸被後轉化成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教條主義者。他對於宗教的壟斷及偏見以及企業與行會對工人的不公義壓迫的批判，對政府干預以減少貧困的接納，均受到當代的新自主義辯士的忽視(許寶強 2007b)。儘管新自由主義辯士對其教義及教士並不特別認真，但仍不斷重複放任和私利等老調，而新自由主義的一套語言，也歷久不衰地成為了不証自明的常識⁸。

新自由主義的套話之所以能夠不斷再生產和傳播，主要依靠其論述的「無限彈性」，也就是從不認真地據實說理，卻常採用意義含糊、內容空洞甚至互相矛盾的修辭和概念鼓吹其教義，例如經常指摘左翼政客無知(「無經濟學頭腦」)，又或宣稱「經濟學專家」或「經濟學理論」已「證明」了放任最好(如降低關稅有利貿易及經濟增長)、政府干預最壞(如最低工資必然提高失業率和破壞經濟)。然而，「如果有人試圖在〔經濟學〕文獻中尋找能解釋這些明顯事實的任何東西，他一定是在白費氣力」(Polanyi 1957, 中譯頁180)。而在受到挑戰及批評時，往往會採用「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市場運作將產生更好的效果」這類未來式的詭辯，逃避實証的檢定。

儘管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稍為鬆動了把它等同為私有產權、自由市場、理性操作和穩定工作等迷思，但這些意識形態仍然頑固地不斷再生產及散播。本文認為，這與資本主義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特定的意義和情緒構成的情感-象徵秩序(affect-symbolic order)所支撐有關。而構成當代香港的情感-象徵秩序的，主要是建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各式空洞能指的民粹政治和附隨衍生的犬儒心態，這將在下文討論。

⁷海耶克不僅提供了一些政府應如何干預的原則，在一些具體的經濟政策中，海耶克也曾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想法。例如他認為禁止或規管使用一些有毒的物質、要求特定的衛生安排和限制工作時數，是完全可以與市場競爭並行不悖；而提供廣泛的社會服務也不一定與市場競爭矛盾，只要這些社會服務並沒有令競爭在大範圍中失效(“To prohibit the use of certain poisonous substances or to require special precautions in their use, to limit working hours or to require certain sanitary arrangements,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competition... Nor is the preservation of competition incompatible with an extensive system of social services - so long a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se service is not design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competition ineffective over wide fields”. Hayek 1994a: 43)。1945年4月，海耶克在一個電臺節目中回答兩位芝大教授提問時，曾明確指出，儘管他認為對所有行業都適用的最低工資立法並非是達至其目標的明智方法，他並不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因為這能夠造就整個制度(市場)的平等條件。此外，在被問及是否反對政府應組織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他也清楚地表明並不反對，只對這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強制性的問題上有所保留；而在被問及是否支持一個保障全民都能獲得最低收入的設計時，他也毫無疑問地回答「支持」。(Hayek 1994b)

⁸例如，在香港，把香港經濟等同為自由市場已鮮有遇到質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曾就「削減車用燃油稅」動議辯論總結發言中，說：「由納稅人補貼個別行業的營運成本有違香港一直奉行的自由經濟和公平原則…」，又指出：「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政府並無權力釐定燃油的零售價」。這些說法，均假設了香港等同自由經濟/市場是不証自明的常識。

語言是經濟的基本因素

經濟學或商界所指的經濟「基本因素」(economic fundamentals)，是失業率、通脹率、消費者信心數據、出入口增長率等統計指標；一般的輿論認為，透過閱讀這些統計數據，我們便能夠了解經濟狀況的好壞。不過，在當代全球金融主宰經濟運作的社會脈絡下，我們可以經常看到金融市場表現與「經濟基本因素」脫節的情況⁹。例如，香港股市的走勢，基本上與實質經濟數據脫鉤，而更受全球的熱錢游資左右。問題是，這些熱錢游資，如果不是建基於經濟「基本因素」來決定其投資/投機方向，所依據的又是甚麼？

意大利經濟學者馬爾華茲在他的《資本與語言》(Marazzi 2008)指出，當代金融世界的經濟運作，依據的基本上是言說行為(speech acts)和語言常規(linguistic conventions) -- 除了由於金融市場的操作必須依賴經常性的資料和信息交換之外，還在於言說行為往往對金融市場的運行產生極重要的影響。而語言之所以能實質影響股市行情，主要是透過一個共享特定語言常規的金融投資社群作為中介。

建基於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和凱恩斯政策的福特主義時代終結之後，取而代之的是馬爾華茲所謂的「新經濟」(New Economy)，其基本特徵，是語言成為了商品的生產與流通的主要中介¹⁰。馬氏進一步分析，所謂的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依賴的其實是一種羊群理性(mimetic rationality)，當中建基的，是全體投資者的制度性資訊負債(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deficit)，也就是在資訊爆炸年代下，投資者的注意力供需嚴重失衡的狀況。馬爾華茲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Herbert Simon 的說法：「資訊消費的對象十分明顯，就是注意力。因此豐裕的資訊所生產的，就是貧乏的注意力。」馬氏認為，金融市場的泡沫以致「新經濟」的危機，基本上源自這種資訊過多而注意力匱乏的結構失衡，當投資者無法消化過度供應的「市場」資訊時，隨大流的羊群投機行為就會變得符合理性。或正如齊澤克(Slavo Zizek)所言：「我們都被逼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做決定」(〈咪齋做，要講！〉阿野、朱凱迪譯，網址：www.inmediahk.net/node/1001296)

因此，在當代的金融市場中求生逐利，無法也毋須仔細分析和比較不同上市公司的表現和潛能，更重要是能猜對別的投資者的動向。因為股市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小投資者的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而這又進一步取決於備受財經官員及大眾傳媒所製造

⁹例如，香港2009年第二季的失業率是5.4%，四年新高；六月的通脹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按年跌0.9%；據城市大學的研究，香港的消費者信心儘管微有回升，但已經連續三季得分在一百以下(二百為滿分)，當中對就業前景最乏信心，只有74.8分；出口表現在六月份的按年跌幅是5.4%，儘管比上月的跌幅低，但這主要受惠於國內的短期刺激措施，而輸往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貨值，按年跌幅則達23.7%；自然，我們還可加上上半年訪港旅客人數下跌3.4%這經濟數據。在差不多所有的經濟「基本因素」依然滯後的狀況下，香港的恒生指數卻仍連升十多天，在過去的一個多星期上升了約百分之十。

¹⁰在當代的香港社會脈絡下，想想成行成市的各式公關和代言人，再看看我們不見樓房的地產廣告，便大抵可明白馬氏所指之意。

的公共言說左右的投資社群所共享的語言常規和信念。財經官員、大眾傳媒所製造的公共言說，不僅表述「現實」，往往更同時創造「現實」¹¹。

正如馬爾華茲指出，金融危機其實是金融市場和投資者自我指涉或自我實現預言的過度生產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s a crisis of the overproduction of self-referentiality.” Marazzi 2008: 35）。與自我實現預言互相築構的羊群效應，或類似由語言建構現實的股市的運作方式，其實也同時存在於金融市場以外的其他領域，例如宗教、教育、普及文化、大眾傳媒、甚至政府政策等。

以香港為例，房地產市場之所以能維持壟斷，為資本積累提供條件，與政府推行施政所依賴的一套語言有關。這套語言建構了一個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當中歧視中低收入社群的居住需要，支撐了把房屋轉化成投資或投機工具，引用「實而不華」、「努力儲蓄」、「自力更生」、「腳踏實地」、「按部就班」等修辭，建構一個文詞世界、意義系統，或打造和維持一種主流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透過分類和命名，建立一個由差異構成的等級秩序，例如中低收入社群只配擁有「實而不華」的住房，而「豪宅」則是高收入社群的專利，當中充滿對高收入的經濟投資需求的偏好，對低收入人士建家安居需求的歧視。與布爾迪厄(Bourdieu 2005)所描述和分析的法國小資產階級類似，欲購置私樓自住的中低收入港人，也同樣成為了充滿文化暴力的象徵秩序內的受害者，當中透過廣告和其他公共論述，強加新的需求和欲望於他們身上，迫使他們盡量追逐由這文詞世界、意義系統所建構的價值和理念，花費重大的物質和心理投資於購置樓房、以樓換樓，希望能從「實而不華」的夾屋，「向上流動」至「華而不實」的「發水豪宅」；然而，他們獲得的，往往是無休止的負擔。

情感是政治的基本因素

情感(affect)或情緒(emotion)¹²近年日益受到談論，以至有論者認為，現代社會是情感量爆炸的年代(見 Furedi 2004；甯應斌、何春蕸 2012)。情感的泛濫伴隨着情緒管理和反思的興起，各式教人控制情緒的書籍、課程、計劃、機構大行其道，情緒智商(EQ)也有取代智商(IQ)之勢。

現代社會的轉向情感(affective turn)，往往表現為把社會問題轉化成個人的情緒問題，例如把貧窮理解為個人自理能力或 EQ 缺失、把有異於主流的性傾向理解為心理情感的失衡或變態；大眾傳媒的資訊，大都附上愈來愈濃烈的情感元素，以吸引讀者；在公共政治領域，示威集會除了表達政治觀點外，也同時是宣洩憤怒、苦悶、厭惡、怨恨等情緒的場域；與此同時，公眾往往要求政客需更有「人性」，也就是不忌憚於公共場合表露私人感情，於是愈來愈常見政治人物的眼淚。Furedi (2004) 因此指出，在現代社會(如英美)，私人情感正逐漸取代過去的意識形態，主導了公共政治的操作。事實上，當代很多政治活動往往由政客或民眾的情感推動，如對

¹¹例如2009年中國內地股市的大上大落，股價在世界經濟前景極不明朗下節節上升，恐怕都與股民相信中央政府由於臨近「十一」六十週年國慶，將不惜代價維持金融股市安定繁榮有關。而前兩天內地股市大幅回落，據報是由所謂「八大利空」的「傳聞」所導致，而所有這些「傳聞」，在跌市前都是未經證實的。如果「傳聞」已有如斯威力，那麼由政府公開發放的消息，自然更能引導市場的走向。我們大概還未忘記，來自中港官方，甚囂塵上但最後仍是不了了之的「港股直通車」、「資金自由行」消息，在2007年底曾對香港股市產生了起死回生之效。

¹²情感(affect)與情緒(emotion)並不完全等同，不同的理論傳統會作出不同的細微的劃分，不過，由於本文旨在指出情感或情緒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位置，而非細緻地討論兩者的分別，因此基本上把兩者等同地使用。

外族的厭惡或對政權的憤怒，甚至願意參與理性的政策辯論，建基的也是一種渴望或欲求講理、抗拒非理性的情感。而對新自由主義語言和意識形態接受的原因，與港人的恐共情緒不無相關。

以香港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為例。在立法之後，一些以中產階級為對象的香港報章，以顯著的篇幅比較大學生的收入與清潔工和保安員，標題是「洗廁所薪金追貼大專生」或「大學生人工，低過清潔工媽媽 80 後：好灰不知為什麼讀書」¹³。這些報導並非僅提供客觀的訊息，而是同時附送個人故事中憂慮和恐懼的情感，而正是在資訊及情感的兩面溝通下，才有可能產生抗拒最低工資，以至間接地支援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效果。

拉克勞在 *On Populist Reason* (Laclau 2005) 一書指出，了解民粹主義的操作，是打開理解當代政治運作的鎖匙。作為一種政治邏輯，民粹操作依賴的是一種截然對立的敵我建構，以便把內部紛雜多樣的「人民」，打造成擁有同一訴求（和敵人）的集體身分，當中需要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為中介，以建構一種不可能存在的統一體（例如「自由市場」）。因此，民粹政治的操作，並非建基於邏輯及理性，而是大量的情感的投入。

「新自由主義」教條的接收及擴散，也並非僅透過語言認知的層次，而同時包含情感的投入，特別是（對創造出來的敵人的）恐懼和怨恨。恐懼、虛無、厭惡、憂慮和憤怒等情緒，往往是民粹政治的情感支柱。因此，「新自由主義」其實是透過民粹政治的操作來完成的。

凱恩斯(Keynes 2004)指出，在 19 世紀主導著西歐的自由放任觀念，並非源自 Adam Smith 和 Ricardo 等政治經濟學大師，而是出於政治哲學家之手，再經一些二流經濟學者（secondary economic authorities）和教育機器（educational machine）的不斷自我複製，終於成為了主宰一時的陳腔濫調（copybook maxim）。凱恩斯認為，放任主義之所以在 19 世紀大行其道，除了是對 18 世紀無能和貪腐的政府的情緒反彈外，也得力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庸俗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的流行，同時又受益於放任主義的簡單易懂和其論辯對手——保護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脫離現實。不約而同，博蘭尼在其名著《大轉變》（Polanyi 1944/1957）也論及自由放任觀念的興衰。他指出，19 世紀興起的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和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的混淆，反映了經濟學理論的混亂，包括缺乏與理論相符的實證和連貫一致的分析。

凱恩斯和博蘭尼都批評放任主義者思想混亂，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與事實不符。這些指控，其實是反映了「自由放任」和「經濟自由」等空洞能指的屬性——它們並非要表述任何具體和正面的內容，只是嘗試扣連無法真正統合的「人民」紛雜訴求。而同樣空洞的「保護主義」和「社會主義」，則正好作為「人民」的敵人，成就推動社會往資本主義方向轉變的民粹大計。換句話說，「放任主義」在 19 世紀以至過去 30 年間的流行，彰顯的恐怕不是政治學者或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而是民粹主義的氾濫。

¹³報章引述一位大學生說：「我大學畢業，做文員 5 天工作，……得 8000 元一個月。阿媽做快餐店清潔，……月入 8400 元。咩世界？唉……好灰！」，另一位中五畢業當文員的受訪青年也表示：「由細到大都教要讀書才有出息，但居然人工比做清潔的、倒垃圾的還要低……，讀書都是為加人工，為升職，為生活好些……」（《香港經濟日報》，2011 年 4 月 30 日，A18）

這正是透過引用空洞能指的民粹操作的特質。經濟學常識的彈性空洞修辭，使其能夠閃縮迴避歷史經驗的反證，就像各種狂熱的宗教一樣（Polanyi 1957，中譯頁141-145）。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方便於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紮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社會保障「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¹⁴。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在香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明顯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以本土的中產價值作為想像基礎）和他的「對立少眾」（「新移民」、「綜援懶人」和政府的「福利主義」），例如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¹⁵，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的他者(如「新移民」)的妒恨情感，並據此把人民大眾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民粹訴求，編織並支撐着「新自由主義」的統織(hegemony)。

另一方面，部分社會運動的運作，似乎也在重複和強化類似的民粹邏輯。例如在香港的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建造了「基層人民」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對立，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這些空洞能指，作為有助於統合反對陣營（人民）的共同敵人，並在此基礎之上，嘗試以「基層人民」等另一些「空洞能指」，統合出一種共同的人民（民粹）的訴求（反資本主義）。

¹⁴傳統基金會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影響大眾傳媒的觀點，並從事各種與政府維持友好關係的公關推廣工作。基金會約有三份一資金預算——即 800 到 1000 萬美金左右——花在傳媒和公關推廣的工作之上。除了出版自己的雜誌(Policy Review，後來被 Hoover 收併)，基金會每年還平均發表超過 150 篇文章，刊登在美國最主要的報章雜誌。此外，他們逢訪問必作回答，就算傳媒不打電話找他們作訪問，他們也會主動找傳媒讓後者引用其不斷重複的觀點。不斷重覆某些理論結論以至陳腔濫調，並經常接受記者和傳媒訪問，發表「即食」和簡短的評論，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認為完成了的研究報告，並不會自動去到合適的人手裏，因此有必要做後續的工作，把研究結果直接帶到應該要聽到這些結論、有影響力的人的手裏(“we can not just put out a studies and hope that it can get into right peoples' hand”)。(Abelson 2002 & 2004; <http://www.heritage.org/>;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itage_Foundation)

¹⁵這明顯也是言過其實。訂定了最低工資法例的英、美、澳、紐、日本和歐盟成員國，難道都比沒有訂定最低工資（多以部門的集體談判取代）的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德國等以社會民主主義見稱的國家和朝鮮這少數碩果僅存的「共產主義」國家，更「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如果批評最低工資的說法，並非根據系統和堅實的證據，那麼它們所依賴的，只能是無實質內容和訴諸情感的修辭方法：透過製造（假想的）敵人，例如「社會主義」或「高失業率」，以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也就是一種不帶任何正面的內容、嘗試統合社會上無法完全統合的紛雜訴求的命名(naming)，例如用「大鑊飯」或（扭曲）「自由市場」等內容空洞的概念，企圖裝載、統合市民對未來的各種憂慮和對理想生活的各類欲求——包括中產社群擔心高失業率會導致更多人依賴綜援而加重他們（納稅人）的負擔；基層渴望穩定的職位和收入、擔心失業；以至各階層都渴望以理想的「自由市場」效率對比和拒絕現實的「社會主義」問題。

恐懼與怨恨——民粹政治的情緒基礎

「民粹」愈來愈成為描述香港政治的關鍵詞，但其意思卻愈來愈空洞矛盾。空洞之處，在於「民粹」一詞裝載了各式各樣的行為訴求：或等同所謂福利主義，或泛指所有「聲大夾惡」的行為，又或是指順應「不理性」的民意等等；矛盾在於，當論者政客用這種意義下的「民粹」指評他人時，自身的行為主張往往同樣甚至更為「民粹」¹⁶。這些自相矛盾和語詞的空洞，正好反映了民粹政治操作的一個特點——建基於情感欲望，而非理性邏輯。如果說近年香港確是民粹氾濫，那麼其根源，恐怕正在於裝載並放大了民間的兩種主導情緒——恐懼與怨恨。

例如，最近香港有關同性戀平權諮詢的討論，明光社的蔡志森先生很快便把同性戀平權要求的諮詢，轉化為肛交婚外情這類議題。這種論述方式，訴諸的顯然並非理性邏輯，而是本地民眾對「變態」或失去家庭的恐懼或怨恨等情緒，而這些情緒，則或多或少源自宗教、傳媒、學校等領域中的情感教育，包括以種種污名化的方式，孕育恐懼、羞恥、厭惡。又例如，近年香港有關「雙非孕婦」和「新移民」的爭論，重點也不在於理性分析，以證明真正有多少人來港「爭奪」資源福利，而是偏向於觸動港人對自身困境的憂慮，包括擔心失去土地和工作，而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則嘗試將這些憂慮轉化為對「外敵」的怨恨。這些並非天生，而是經由各種政治力量打造的恐懼、憂慮、怨恨與厭惡等情緒，正是本地的民粹政治的情感支柱。

民粹邏輯的演練，需要含混的空洞能指作為中介，以統合多元紛雜的特殊訴求；也同時需要借助「人民」情感的投資（affective investment），以及一種共同的熱情和欲望。因此，對於民粹政治來說，理性的討論不僅無補於事，更可能在澄清含混的空洞能指所涵括的各種矛盾意思時，幹擾了民粹政治的演練。

民粹政治樹立的空洞能指，經常與人民的具體要求和現實生活所經驗的脫節。這種民粹邏輯運作的不經意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恐怕會強化香港社會的犬儒的傾向。正如齊澤克（Žižek 2007）在批判Laclau的民粹主義理論時指出：

民粹主義有一個基本“困惑”：其基本姿態是拒絕面對局面的複雜性，而將之簡化為一種與偽具體化的“敵人”的清楚的鬥爭（從“布魯塞爾官僚”到非法移民）。因此，從定義上來講，“民粹主義”是一種否定現象，一種建立在拒絕之上的現象，甚至是一種不明說的對無能為力的承認。我們都知道一個老笑話，說的是一個人走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當被問到在哪里丟了鑰匙時，他承認說是在後面那個黑暗的角落裏；可是，為什麼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因為這裏比較亮……民粹主義當中就有這種把戲。（〈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因此，民粹政治產生了齊澤克所指的犬儒主義——「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隨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they know that, in their activity, they are following an illusion,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 it.）。（Žižek 1989）

¹⁶例如，最近有關長者生活津貼的討論，指摘「泛民」民粹的政府和建制政黨，不僅不追求仔細、認真、理性的政策辯論和廣泛諮詢，反要求匆匆通過議案，好讓長者能盡快享有「福利」！相對於堅持拉布及甘願違反「民意」，甚至要求部分長者不要太自私的議員，誰更順應「不理性」的「民粹」要求？

情緒政治的根源

如何理解影響香港政治的集體情緒的成因？要回答這問題並不容易，這裏只能提出一些十分初步的猜想。人類學者阿柏杜華宜(Arjun Appadurai)提出了一個很有趣且重要的問題：為甚麼社會上人口較眾、經濟文化資源較多、社會政治力量較強的「大眾」(majority)，往往會害怕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在人口數目及文化、經濟、政治實力上處於邊緣弱勢的「小眾」(minority)的威脅，甚至想除之而後快？他認為，「大眾」的焦慮，除了是擔心原來擁有的權利和權力受到削弱和挑戰外，更重要的，還基於一種對「純潔」(purity)、整全(wholeness)的偏執追求。循這思路，「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主要並不在於其人數的多寡，因為只要有一位「並不純潔無瑕」的「小眾」的存在，對把自身想象為的單一、整全、純潔的「大眾」族群來說，往往已足夠彰顯出他們所厭惡的不完整、不純潔的現實，就像在門高狗大的豪宅社區內，住了一位流浪漢一樣。

由於厭惡和痛恨彰顯著「大眾」社群其實是不完整、不純潔的「小眾」的存在，「大眾」往往會透過各式運動，嘗試突顯並誇大「小眾」的威脅，例如指出「小眾」已懂得把保護少數社群權利的法律或民主程序，轉化為一種永久的文化及政治權利；更甚的是宣稱倘任由「小眾」存在坐大，最終「大眾」將為「小眾」滅絕。另一位情感理論的學者 Sara Ahmed 則指出，這種挑動「大眾」恐懼和焦慮的策略，往往會透過建構出一個正受到威脅的主體(「大眾」)，宣稱他們將不僅失去工作、安全和財富，甚至會被「少數」取而代之，而「大眾」所採取的具體手段，是通過不斷生產煽動厭恨「少數」情緒的論述、語詞。例如，不斷重覆「綜援養懶人」、或把同性戀扣連肛交等說法，在香港當代的語境中，這些說法容易與毫無貢獻、社會負擔、變態不潔、破壞家庭等負面意思聯繫。

阿柏杜華宜用的是德國納粹、盧旺達、科索沃等對少數種裔的種族清洗，以及印度社會中的伊斯蘭教徒的例子，嘗試說明他的觀點。阿柏杜華宜以印度教徒為例，指出「大眾」其實並不一定人數眾多，很多時只是少數特權精英的語言偽術，嘗試透過放大「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以達致對其有利的政治目的。不過，在當代香港這個被主流中產價值宰制的社會，這種認為「小眾」最終會取「大眾」而代之的恐懼，在嘩眾取寵的大眾媒體中得到滋潤。因此，真正害怕綜援戶會令所有港人變懶或從始再沒有人願意繼續工作者，大概只佔少數；擔心同性戀婚姻將消滅所有異性戀家庭的人，也或許並不太多。然而，基於現實生活中的不盡人意，對前景及自身的能力又失卻信心，受這種訴諸主流中產價值對不純潔、不整全的懼怕所觸動，從而遷怒於綜援戶和同性戀等「小眾」的，恐怕為數仍然不少。

香港有關綜援(或扶貧)流行的論述，指向的往往是如何幫忙綜援者「自力更生」；而有關性少數的流行論述，焦點則經常置放於如何協助他們「重建自尊」。然而，真正有問題的，往往並不是這些無辜的「小眾」，而是對現實上沒有甚麼威脅的「小眾」存在莫名恐懼的「大眾」。阿柏杜華宜的有關「懼怕小眾」的分析，讓我們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恐同、恐窮、恐少數族裔等「大眾」焦慮，很可能只是香港帶點自戀或潔癖的中產價值觀，在無力面對風險社會這類新的社會環境時，自身衍生的問題。

造成這些恐懼和焦慮情緒，教育顯然是重要的因素。香港過去的情感教育，主是源自各種正式或隱蔽課程中的不經意效果，例如以考試競爭為主導的課程和教學法，孕育了害怕失敗的身

心，加上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中散播的生態末日危機，強化了現代港人的恐懼情緒；解除殖民性(decolonization)的難產，令殖民歷史、經驗和制度造就的奴僕心態，仍然瀰漫香江，其情感基調，正是尼采所指的「你邪惡因此我善良」的怨恨；本地的現代文明工程，透過各種制度、規管、語言、道德，只強調「搵食」生存、物質增長，卻對各種生命本能和身體欲望長期壓抑，令個人難以對日常生活產生意義和感覺相干，或是苦悶虛無情緒的根源。這種種因素，在貧富兩極分化、民眾希望短缺的全球語境，以及後九七政權轉移但不民主的殖民體制依舊的社會脈絡下，更容易強化港人以恐懼和苦悶等情緒，成為了感受及理解現代世界的視野。

結語

面對前景不定、環境不善、政權玩假，倡議在個人層面建立自尊、發放正能量，企圖以此回應社會的核心情緒，自然顯得蒼白虛妄；引入針對個人的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嘗試「糾正」瀰漫於社會的「負面」情感，也只是頭痛醫腳、迴避真問題的犬儒弄虛。

想要避免民粹政治的負面影響¹⁷及陷入無力感的犬儒情緒，以及針對股市、樓市以至宗教、教育、普及文化、大眾傳媒、甚至政府政策走向都與經濟(和社會、政治)的「基本因素」脫節的狀況，恐怕得從改變經濟和政治的真正「基本因素」--語言和情感--入手：一方面努力創造新的語言行動(speech acts)和語言常規(linguistic convention)，這除了引入新的語詞和概念外，還必須拆解舊有的語詞和概念的扣連方式，鬆動既有的象徵秩序及其蘊含的評價等級¹⁸。正如格羅斯堡引述另一位學者(Graeber)指出，政治的最終鬥爭，並不在於搶奪分配了多少(被主流社會確認)的價值，而是爭取重新定義什麼才是有「價值」的活動和事物(Grossberg 2010: 160)。

另一方面，也可透過參照英美現代性以外的歷史和當代經歷，尋找能夠克服犬儒虛無的集體情感與身體經驗。例如臺灣電影《賽德克·巴萊》中的原住獵民，面對軍力強大的敵人，坦然直面恐懼、怨恨、苦悶等情緒，正視身體的自然欲望，肯定生命的本能，以舞蹈與歌唱迎接終必來臨的死亡，喊出「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帶你們驕傲的野蠻到底！」除了

¹⁷儘管民粹政治不一定帶來負面的結果，但往往包含了並不十分積極的因素，例如對待弱者和異外者的思想和物質暴力傾向、反智和犬儒的態度等。要限制民粹主義的負面傾向，至少有3種可能的方向：1.批判民粹主義的負面潛能，就如Herbert Marcuse (1998)提出對付法西斯的有效方法一樣---以各種方式講事實、擺道理。而在政治上堅持一貫的原則，並對社會結構作出改動，例如減少貧富差距、加快推動民主政制和鼓勵尊重多元和獨特的文化生活等，均能壓抑負面的民粹政治的發展。2.將民粹主義與壟斷的政治經濟力量分離，為此在政治上的討論不能過於抽象和一般化，例如反對「私有化」和「外判」，得要針對具體的例子(如大學的清潔工)，否則，在香港這個冷戰思維根深蒂固和左翼思潮仍未紮根的地方，泛泛地反「私有化」和「自由貿易」，很容易脫離大部分市民的常識，將民粹的意向讓予壟斷階層。3.各種倡議平等、民主的政治力量也可以嘗試與民粹主義結合。就如Taggart (2000)引述美國的社會批判學刊Telos的討論指出，強調民眾參與的民粹主義，儘管帶有排外和種族主義的危險面向，但尚能結合民主和平等的訴求，也不乏政治解放的潛能。

¹⁸「這種論述策略應被想像為一場具多條戰線的抗爭。第一步是拆解由現存經濟語言的表述支撐的各種資本主義迷思。正如本書的第一至第四章所示，有效的方法是指出這些迷思並不是紮根於實證事實之上。其次，我們可進一步分析這些迷思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然後可以把傳統上跟資本主義這意識形態扯在一起的經濟語言，跟反資本主義力量接合，舉例說，挪用「無免費午餐」和「用者自付」這些新自由主義言論，指出資本主義權力集團的種種偽善。在拆解主流經濟學語言和資本主義世界現實之間的既定關係後，通過再翻釋現有的多元紛雜的「資本主義」行為，或把經濟學語言跟開闢另類經濟(如合作社和社區貨幣等)的過程接連起來，可以進一步使新的經濟學語言(包括置於新的語境下的舊經濟學語言)，在另類經濟的物質語境中培育生成」。(許寶強 2007: 303)

恐懼、怨恨、苦悶，我們是否也應讓「野蠻的驕傲」這種陌生（或久違）的情感，成為推動尋找另類可能性的其中一種情感動力？

參考書目：

- Abelson, Donal E. (2002):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 Montreal & Kingston/London/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Abelson, Donald E. (2004): "The Business of Ideas: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in the USA," in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bham 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 --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215-231.
- Ahmed, Sara (2009): "The Organization of Hate,"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51-266.
- Appadurai, Arjun (2009): "Fear of Small Numbers,"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5-250.
- Bourdieu, Pierre (2005):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Furedi, Frank (2004): *The Therapy Culture – Cultivating Vulnerability in an Uncertain 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rossberg, Lawrence (2010): "Considering Value: Rescuing Economies from Economists,"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 A. (1994a): *The Road to Serfd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可參閱王明毅等人的譯本，《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Hayek, F. A. (1994b): *Hayek on Hayek -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edited by Stephen Kresge & Leif Wen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08-123.
- Keynes, John (2004):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 Krugman, Paul (2007): "Who was Milton Friedma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7/feb/15/who-was-milton-friedman/?pagination=false>.
-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Marazzi, Christian (2008): *Capital and Language*,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Marcuse, Herbert (1998): "The New German Mentality," in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olanyi, Karl (1944/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acon Hill, Boston: Beacon Press.
- Smith, Adam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中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郭大力 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 Stiglitz, Joseph E. (2002): "Employment, Social Justice and Societal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41, No. 12, pp. 9-29.
- Stone, Diane (2001): "Think Tanks, Global Lesson-Drawing and Networking Social Policy Ideas," *Global Social Policy*, 1; pp.338-360. <http://gsp.sagepub.com/cgi/content/abstract/1/3/338>
- Taggart, Paul (2000): *Popu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erhane, Patricia H. (1991), *Adam Smith and His Legacy for Modern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Žiž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Verso.
- 何春蕤、甯應斌(2012)：《民困愁城》，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齊澤克 (Slavoj Zizek 2007)：〈抵禦民粹主義誘惑〉，齊澤克，查日新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 許寶強 (2007a)：《資本主義不是甚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許寶強 (2007b)：〈自由競爭的真義〉，《讀書》，2007年第4期，頁3-11。
- 許寶強 (2009)：《告別犬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許寶強 (2012)：《告別犬儒續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